

费孝通

社会学 在成长

*Shehui Xue
Zai Cheng Chang*

天津人民出版社

费 孝 通

社会学在成长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社会学在成长

费孝通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插页 120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7-201-00476-X/C·55

定 价: 2.50 元

目 录

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	(1)
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6)
中国人口分布问题的探讨·····	(13)
在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	(18)
长江荆江段和洞庭湖地区综合治理问题·····	(34)
压力·时机·对策·····	(37)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	(51)
发挥民族优势脱贫致富·····	(60)
访骆驼之乡·····	(66)
南岭行·····	(78)
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	(87)
四年思路回顾·····	(96)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	(137)
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	(177)

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

我想在此回顾一下过去我国社会学发展的大体经过，检验一下我们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1979年3月召开了有各方面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后来改名中国社会学会），接着着手筹备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之后，用学会名义办了5期学习班，吸引了很多对社会学研究有兴趣和热心重建社会学工作的中年同志参加到社会学队伍里边来，到现在，他们已成为我们的骨干力量。后来，许多省市先后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机关。在我们筹备社会学会和研究所的经验的基础上，又着手筹备成立各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工作，到1982年基本就绪。我自己也转到具体研究工作上来了。现在，已有12所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还有不少大学设置了社会学专业，不仅有了本科生，还招收了研究生；培养了硕士生、博士生，我自己也做着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目前，在校 生已有1000多人，科研人员也近千人，副研、副教授等高级职称的同志有200多位。

1984年，我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我的社会学工作岗位转到了北大，1985年初在北大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最近，又扩

● 1988年7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学学术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

大力量，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与发展研究中心。

我个人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小城镇”，这是个乡镇社区发展的课题。到1984年，我又把研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西部边区的开发问题上，就是我常说的下棋要做的两个“眼”。

开始筹建社会学的时候，我们一直遵循着一个方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我们过去到现在一直没有背离的原则。我想这一方针应当继续是我们大家今后工作的指导原则。

回顾过去，加深了我们对中国改革、开发的认识。发展乡镇企业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公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经济建设的一个必由之路，是我国农民自己创造出的一种工业化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

现在，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即要深化改革。为了深化改革中央已指出了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同时指出，沿海地区的发展必然会带动中部，特别是西部地区。我们的边区研究工作，适应了这个形势。由于大家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初步取得一些成绩，现在看来，我们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没有离开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方针，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

不久前，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提高马列主义社会学在解决苏联社会的关键社会问题方面的作用的决定》（见1988年6月24日第22702期新华社版参考资料），要加强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在他们看来，在改革过程中，特别需要借重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弊端及其相互影响，进行科学的分析，使人们在改革的进程中可以比较少地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我们也面临着一个改革、开放的、重要的、关键性时刻。我们也应

该用社会学的观点去研究当前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社会学的队伍还是比较年轻的，我们很多老年的同志，有的在这段时间里过世了，而新的一代还正在成长中。在社会学队伍里边还存在着新老衔接的问题。我们希望老年同志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更需要的是年轻同志赶快成熟壮大起来，使得中间不发生断层。我们要有个衔接的发展过程。

同时，我也有责任提出，当前社会学队伍里边，由于受不正之风的影响，也发生过一些问题。如，以社会学的牌子为个人谋取私利。这虽只是个别的，但是值得我们警惕。

我们这一门年轻的学科，水平不能要求一致。可是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凭自己的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断追求上进。同时要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特别是在科学研究领域里应当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我们决不能用一种理论、一种学说来包办中国的社会学。我们必须欢迎兼容并包，只要它是科学，就得实事求是，有事实根据，看法可以有所不同。这并不妨碍我们本学科的向前发展。不仅不妨碍，而且会有帮助。否则，会走到思想僵化的路上去。只有我们多讨论、多研究，不同的看法，可以取得一致。假如凭自己的主观出发，不是从自己实际看到的事实里边得到概念，而硬套到我们中国的实际上边去，那是不会取得好结果的。

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自己对社会学今后应当做点什么事。我自己的年龄已近八十，现在所担负的职务也越来越重了，我确实觉得由我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很不够。我这些年一直希望搞一些研究，但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做研究工作。我很希望大家能谅解我，减少我在社会学领域中为大家服务的具体任

务，即让我能解脱社会学学会方面的工作。

1986年在北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学会的改革问题，得到了胡绳同志的支持。他很希望我们社会学学会能带头对于中国的各种学会的体制上有所改革。我们同许多同志一起协商，认为学会是为科学家进行学术活动服务的机构。每个人的学术地位是由他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决定的，不是由学会中的职务决定的。因此，我想社会学学会的组织应该实事求是的简化，精减。应把我们全国性的学会作为联络机构，配备一定工作人员处理日常事务。把实际工作，即社会学研究工作，学术讨论工作放在地方。现在各地方都有社会学学会，让各地方的社会学学会作为一个实际工作的单位，它们可以单独活动，也可以联合其它地方学会活动，也可以召集各种专题的、或邀请各地方参加的专题讨论会。一切都要以学术为主，要提出确有研究成果的论文，互相讨论，互相提高，不能为开会而开会，不能为选举理事、选举会长而开会。学会和行政机构是完全不同的，学会应以联络、服务为宗旨。具体组织办法请大家讨论，充分发扬民主。

至于我自己，我已多次表示，我不再担任学会会长职务，不过我还是要用我的今后的岁月来为社会学工作，作为我们队伍里的一个成员。过去我任会长期间，由于主观上的原因和许多条件的限制，在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尚希大家予以批评指正和谅解。

我一生从事社会学工作，主要是要了解中国社会，为了使得中国更富更强，不能在全世界、这个世界一体、这个世界大社区里，失去我国应有的地位。我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现在，国家形势对我们要求很高，我感到社会学这个队伍

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加强。希望已有的各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志能多培养出能进行调研工作、能接触中国实际、有进行理论分析能力的一代新人。

今后工作很沉重、很艰巨，我自己一定承担我自己所能承担的工作，在各位同志的督促和监督下，帮助我，使我这一点愿望能够实现。

最后，我想到明年，1989年是重建中国社会学10周年，各位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开一次有水平的关于社会学的讨论会，我们也可以在这次会议上进行国际交流，使各国都知道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用这个会作为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10年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换届，进行改革，就是说不仅是换届，而且是社会学会的改革。

1988年7月30日

（王志成执笔）

见《社会学研究》1988年6期

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

从1979年提出要在复旦大学建立社会学系至今，已有七、八年了。社会学恢复名誉后，全国第一个招收社会学本科生的高校，是上海大学文学院（当时系复旦大学分校），以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相继招收本科生。今天，复旦开办这个社会学研究生课程班，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目前，我国社会学进入一个新的初创阶段。过去是挂牌阶段。由于社会学从1952年被取消后，社会学的牌子被打烂了。1957年一大批搞社会学的人被打成右派。我本人被打成右派的“罪状”之一，就是为恢复社会学说过几句话。1979年以后，社会学恢复了名誉，牌子挂起来了，挂牌子是不容易的。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误解没有消除。另一方面，过去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大多过世了。我们这第二代从事社会研究的人。现在八十多岁那批社会学家，最老的是吴泽霖、雷洁琼等，还有李景汉，但他已去世了，只留下两个了。吴泽霖教社会学六十年，最近我想去探望他。往下算是我、田汝康等七十

* 1987年9月10日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多岁那些人，现在也不多了。再下来，是六十多岁那批人。他们比较特殊，差不多在他们毕业的时候，社会学就被打烂了。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搞过实际的社会学研究。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社会学重新恢复。1979——1980年招的两批社会学师资培训班，培养了一批中年社会学研究和教学人员，如沈关宝、刘豪兴、杨心恒等，当时他们以集体编写《社会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方式，展开了对社会学的初步探索，他们现在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的主力军。

有的学员问，社会学目前的实力如何？我的回答是，实际上还很薄弱，力量很小。这一方面同我们自己主观上努力不够有关，但客观上我国整个社会科学都同社会学一样，经历了狂风暴雨，社会学和他们是难兄难弟。中国的社会科学，称得上真正用科学态度进行研究的还刚刚开始。你们这一代主要不是继承，而是在开创。要开创真正的中国式的社会学。所以我说目前是社会学的初创阶段。

二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进行社会学研究，条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我们应当有能力搞好我们的社会学。从人类社会开天辟地以来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我们的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一直呆在家里的人，可能并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这些经常在外跑、考察的人，对这一点深有感触。我们社会的这种大变迁，就是我们社会学的最生动的课题。以“文化大革命”为例，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它是怎么搞起来的，它不可能一下子、由一个人想出来的，还有红卫兵是如何产生的等等，都有

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我们目前还没有人好好研究。而“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影响真太大了。你如要识别一个人，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最能识别人的。社会学研究人际关系嘛，那时，每个人的品质都得到充分的表现。本来对您满恭敬的人，一下子翻了脸。有谁能对此进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能拿出一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就很了不起了。但我们国内对此研究得不多。国外有很多人都在收集研究，最近有人寄给我一本外国人写的书，书名叫《Enemy of the people》。这是一本外国人写中国写得较好的著作，而我们自己总把它看作突然时期，这么一突然，就让他突然过去了。自己不研究太可惜了。

搞科学研究好比烹饪，做菜要有原材料：海参、竹笋、蔬菜等等，当然还要有佐料。社会学的研究素材太多了，我们日益变迁着的社会是极好的社会学研究素材，社会学与烹饪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本身也生活在研究对象的客观社会之中。我们既要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又在影响社会，也受社会影响。只有到了我们认识成果能够影响社会的时候，社会学才算有了一点作用，但我们的认识常常落后于实际。一方面社会变迁太迅速，象陶渊明向往的那种不知秦汉的人照样可以悠然自得地生活的社会，毕竟是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只有在主观上多观察，多接触实际，认识现实。社会是不那么容易给人们认识的。所以，需要我们自觉地去认识它。

三

下面谈谈我研究社会的一些具体项目。最近，我在外跑了两个月。先谈江苏，我是个老江苏了，江苏的问题，我一直比

较关心。从客观上看，目前江苏有两个现象比较突出，一是工业，第三产业发展比较快。另一方面，近来农业发展比较慢，粮食少了，产量低了。于是就有人将二者联系起来，把农业生产的停滞或下降归罪于新兴起的工业和第三产业。曾有人认为我们讲“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讲得太多了，农民都不想种田了，对于这种看法，我是不同意的。本来我们讲“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前面还有一条就是“无农不稳”嘛！目前江苏农村农业上不去，有许多原因，去冬今春，最突出的问题，是肥料失控。没有化肥，农民怎么种田呢？而化肥本身就牵涉到工业，所以不是工业讲得多了，而是工业发展得还不够。以江苏一些工业发展得最快、效益最好的地区来看，那里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收入，开始与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人员大体相等，有些地方甚至农民收入超过工人。为什么？就是工业发展了，反过来支持了农业，扶持了农业。

这里有两个条件需要进一步研究。首先是土地责任制如何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现在农民承包的责任田大体分两部分：一是完成定购任务的部分，另一是保证自己口粮和饲料的部分。以苏南地区的情况来看，平均每人承包土地一亩多。假如一家四口，则一户土地面积不过五亩左右。再以每亩收入以每年二百元计，则五亩地不过一千元。除去化肥、粮种等成本，还要少些。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上不去，这种状况对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有影响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必须扩大责任田，比方说，每人二十亩。但实际状况是人多地少，不能搞平均主义，办法是要把农田里的人抽出来，扩大人均耕地面积。这样就可以把分散的责任田收起来，交给若干种田大户去种。这个办法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试行了，但是这里有

个问题，即农田里抽出来的劳动力又如何安排？出路只有靠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

第二个条件，是农业要发展，不能只靠两只手去干，要改善产前产后的服务系统，主要是机械化，但现在的问题是，国产的插秧机质量还不过关，农民不大肯买，日本的插秧机倒是过关了，但价格比国产的要贵。现在一些工业上得快的地区，如无锡、常州等，村里就买得起这种插秧机，因为他们的工业发展得快，有能力扶持农业生产。总之，我们的结论是，只有进一步发展工业，才能更好地促进农业的发展。我们不是讲工业讲得太多，恰恰相反，我们讲得还不够。

乡镇工业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我把它称为草根工业。他好比一个孩子，孩子（指工业）长大了要帮助“妈妈”（指农业），这就象鸟类的“返哺”。“还哺”也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家庭原则嘛，这个比喻只是在于说明草根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它们并不是对立的。总之，现在的农业要上，就必须进一步现代化。

我们进行社会调查研究，需要科学的态度。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所谓科学性就是要经得起反复的检验。实际摆在那里，人人都可以去看，经不起别人去看的，就不行。对客观对象进行科学研究，就要自觉地认识客观实际，如何认识，概括起来，就是要勤于归纳，不断总结新情况。

四

我最近跑的第二个地方，是内蒙古及西北。我们把内蒙古概括为南农、北牧、东林、西铁。农、牧、铁地区我过去到过、可林区我没去，这次去看了内蒙古的林业。后来我又去参

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活动一结束，我就从内蒙古经宁夏、甘肃再到青海，作了一次实地考察。

我是长期搞民族研究的。以前，我们总有一个想法，少数民族好比小弟弟，小弟弟历史上吃了亏，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没有饭吃，就多送点粮。过去的民族学者也没有注意少数民族怎样能靠自己的优势发展起来，其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长，不然的话，它就不可能生存下来。

这次去了临夏，在甘肃南部，是一个主要由回族聚居的地区。去年我也到过那里，今年又去了。我看到了临夏的变化，使我发问，回族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回族能在甘肃至青海这条狭长的走廊里面，聚集了八万以上的人口，而且一直不离开呢？为什么，就是为了做生意。这同回族的特点和历史有关，他们在历史上以经商为生，迁徙于青藏高原的牧区和中原农区的交界地区，促进了两区间的物质交流。而且整个民族也在这个过程中尝到了贸易的甜头。所以回族经商的人多，有商品头脑的人多。他们一直充当着商品交流的使者。解放后“左”的路线使他们倒了霉。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了他们就活跃起来了，短短的几年，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有气派。1986年我去临夏，那里的运输队伍已拥有一千多辆卡车，组成那么大的运输队伍，国家没出一分钱。有的回民只需两三年就盖起了瓦房，而且都很有气派。为什么那里的回民富得那样快，就是因为他们发挥了历史形成的民族优势，是政策对了路。

我去看了以后，就想这是发展青藏高原的一块跳板。青藏高原虽然农奴制度取消了好多年，但人民的观念没有变。解放后国家花了许多钱支援那里的经济，但那里的人普遍没有货

币、商品的观念。许多地方，宗教大师一到，众人倾囊上贡以求来世升入天堂。在这种地区要发展经济，怎么办？就需要商品化。商品化不会自己产生，它只能萌芽于物质交换，频繁的贸易环境中。因此就要有人送货上去，回族的贸易大军正在把东部制造的消费品送到青藏高原去，把那里的牧产品、原料运出来、他们完全有能力，有办法组织这样的贸易大军。大家都能获得发展。因此我建议临夏（甘肃南部）海东（青海东部）成立原来同属于河州的经济协作区。现在，经济协作区建立起来了，两省的领导见了面，签订了协议。实际结果如何，还须看今后的发展。

我对你们讲了这些事情，为了说明从事一项社会研究，不要纠缠于具体名称，你说是经济学也罢，说是社会学也罢，关键的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进行研究要和“穆桂英破天门阵”一样。“天门阵”有它自己的结构。结构中的各部分都有功能上的配合，是一种系统工程，你识破了这个结构，揭示了它的关系，也就能设法击破这个“天门阵”，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我讲小城镇建设。发展小城镇是什么意思？说到底，就是要发展商品经济。乡镇工业建立起来后，现在全国的产值一年达到三千三百亿，并安排七千五百多万农村就业人员。短短的几年，能有这样成绩，很不容易。

以上，你们听到的只是具体的研究实例，听过了以后就要去实践，学要活学，不能死记，对你们来说，怎样才算把社会学学好了？一句话，就是能找出使千家万户富裕之路。

中国人口分布问题的探讨*

今天，有机会在澳门东亚大学李约瑟博士卓越学者讲座上发表讲话，深感荣幸。我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和李约瑟博士相识，从此他一直是我尊敬的老朋友。我谨对给我这个机会的澳门东亚大学及林达光先生表示十分感谢。

我想借这个机会同诸位交流关于中国人口与发展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人口分布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在世界人口总数突破五十亿的时刻，这一探讨无疑更有意义。

人口众多向来被看作中国的特点之一。本世纪初叶，即在我年幼的时候，我们熟悉于“四万万同胞”这个说法。二次大战后，人口增加到五亿多。到八十年代，中国人口已在十亿之上。解放前的三十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亿，解放后的三十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这表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是大大加快了。

在过去三十多年，我国人口增长曾经历了几个高峰。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323%。1965年为2.838%，1970年为2.583%。从七十年代以来，人口压力促使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控制人口的措施，做了许多努力，卓有成效。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85年的1.78%。

* 1987年10月澳门东亚大学李约瑟讲座的讲稿。